

欧亚备要

陈戈 著

新疆考古论文集

上



1911年10月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新疆考古论文集

上

陈戈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编者的话

“欧亚备要”丛书所谓“欧亚”指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这是一个地理范畴，大致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东中欧。这一广袤地区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动，内陆欧亚各部（包括其周边）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内陆欧亚常常被研究者视作一个整体。

尽管司马迁的《史记》已有关于内陆欧亚的丰富记载，但我国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长期落后于国际学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急起直追，严格说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筚路蓝缕的情景，不少人记忆犹新。

由于内陆欧亚研究难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往往多于其他学科。这也体现在成果的发表方面：即使付梓，印数既少，错讹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论著终于绝版。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发大愿心，选择若干较优秀、尤急需者，请作者修订重印。不言而喻，这些原来分属各传统领域的著作（专著、资料、译作等）在“欧亚”的名义下汇聚在一起，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视野的开拓，其意义显然超越了单纯的再版。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出版时期、出版单位不同，尤其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诸书体例上的差异，这次重新出版仅就若干大的方面做了调整，其余保持原状，无意划一，借此或可略窥本学科之发展轨迹也。

愿本丛书日积月累，为推动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一点作用。

自序

本论文集共选录 38 篇文章，除少数几篇是写作和发表于 2000 年以后外，其余都是完成和问世于 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按其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或可分为几组，每一组均按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除个别文章由于当时的刊物编辑未与作者相商而擅自做了修改或删除，从而有失原意或造成语意不通，故而这次又重新改回或稍做通顺外，其余均仅仅校勘和改订了一些错排和误印，基本保持原貌不变。

第一部分是综述，共 3 篇。其中的《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全面论述了新疆境内的几条主要交通干线和其东西两端的数条起始和终结路线，以及各主要干线之间的许多支线及其兴衰变化情况，《新疆考古述论》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整个 20 世纪新疆考古研究的历程和现状以及对将来的展望，《新疆古代文化遗存概说》简要介绍了新疆地区古代文化遗存的数量、分布、特点和价值意义及对它们的保护和研究概况。

第二部分为史前时期，共 25 篇，可分为三组。第一组 13 篇，除一篇是论述齐家文化应属于青铜时代外，其余均是对新疆史前时期许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其中主要有：对新疆彩陶的研究和认识，对新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及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认识和界定，对新疆铁器出现较早的介绍和认识，对新疆史前时期概念的定义和具体内涵的实际运用，对新疆史前时期诸多文化遗存的类型划分和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和认识，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未发，均为第一次提出的新观念和新认识。第二组 5 篇，是对新疆史前时期几种考古学文化即焉不拉克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苏贝希文化和

伊犁河流域文化的专门研究和论述，它们的发现和确认彻底结束了新疆地区没有具体确定的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历史阶段，可以说使新疆考古学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三组 7 篇，都是一些比较短小的文章，是与他人就某些问题，主要是关于焉不拉克墓地、察吾乎沟口文化的名称、分布及时代，新疆有无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如何认识和界定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等问题所进行的学术争鸣。对于必要的学术争鸣，我是非常看重的，因为它可以通过辩论而摒弃不当的认识并确立正确的观点，从而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同时为了与别人辩论并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就必须翻阅大量的资料来充实自己，这对个人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和学习。当然，学术争鸣必须理性，我是遵循这一原则的。

第三部分为历史时期，共 10 篇，可分为二组。第一组 7 篇，主要是关于某些古代城址和道路的历史地理考证，其中有对焉耆国、尉犁国和危须国都城的研究确定，有对楼兰国都城及其相关城址的考证定位，有对唐代轮台城的考定，有对别失八里名义的考证研究，还有对陈诚经行新疆所行路线的疏证等。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写作于 20 世纪的 80 年代初，是根据自己的亲身实地考察并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而进行的一些研究，自认为这比仅仅依靠文献资料而进行的考据似乎要略胜一筹。但是应该指出，由于对这些古代城址缺乏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仅凭简单的地面调查而得到的资料依然是片面的，再加上各位研究者对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理解和看法不尽相同，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未必能取得共识。正因为如此，后来我就不再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了。而更重要的是，当我真正深入到了新疆考古研究工作中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做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考证了，因为新疆考古研究的课题实在太多了。这也就是说，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当一个考古工作者还没有真正体会到新疆考古研究的博大精深或不知从何入手时，才不得不写一些与考古有一定联系的历史地理方面的考证文章。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我已经发表的文章，实际上这些文章至今看来还是有理有据的，否则我也不会将它们选入到论文集里来，我只不过是想借此来表明一下我的学术研究历程和变化而已。第二组 3 篇，各自独立不相属，其中一篇是对昌吉古城出土的一批蒙古汗国主要是察合台汗国银币的确定和研究，一篇是对新疆地区佛教起源和流行的论述以及对各个地方奉行不同教派

原因的分析讨论，另一篇是对新疆地区洞室墓葬的研究探讨。

上述这些文章，时隔多年之后再次读来，个别篇章已有过时之感，例如最早写作发表的关于新疆诸多文化遗存的类型划分和时代讨论的文章。不过这是新疆考古研究历程中必然要走过的步骤和阶段，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才有了以后的不断精化完善和充实提高，从而总结出更高层次的比较合理正确的许多结论来。因此，它们虽有过时之感，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过程来看，依然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其他的绝大部分文章迄今为止似乎还是站得住脚的，或者说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至少我所提出和主张的许多观点与见解还未被否定掉。就此而言，我自感欣慰。当然，也有需要补过之处，在这里仅举两点：一是在《昌吉古城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研究》一文中，考定出一个铸造地点是“努拉特”，并说其“系何城，位置何在，不清楚”，后经博乐市达勒特古城出土的铜币证实，此“努拉特”应为“布拉特”，实即文献记载中的“不刺城”和“孛罗城”，亦即现存的达勒特古城（参见韩雪昆《察合台汗国铜币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第8—14页），特此补正；二是在《新疆发现的竖穴洞室墓》一文中，认为新疆地区的竖穴洞室墓最早是出现在西汉时期，现在看来可能有一些偏晚，因为后来发现的一些资料似乎显示有些洞室墓可能会出现在汉代以前，不过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材料的验证。

二

从上面的内容介绍可以看到，本论文集集中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史前时期的，这也就是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在史前时期。是的，当我真正踏入新疆考古研究领域并全面收集阅读了已经发表过的所有考古研究文献之后，发现新疆史前时期的文化面貌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一方面是已有的资料缺乏科学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是对这些资料的判断和定性也有一定的误区，于是我就想在这一领域做一些努力和探索。

从大的方面讲，我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在田野工作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多调查而少发掘，对一片墓地仅发掘其中的几座并只发掘墓坑却不管其周围遗迹现象，墓葬发掘记录仅填一张简单表格等比较粗犷的工作方法，

而是强调考古发掘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对一片墓地进行较大规模的全面揭露，在发掘过程中严格操作程序，对每一个环节都要有详细的文字和图像记录，从而极大地保证和提高了考古发掘资料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完整性。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轮台群巴克墓地的发掘中，在同一座墓葬中亲眼看到既有彩陶又有铜器还有铁器时，心中的踏实感油然而生。另外，我还想改变一下过去那种只发掘墓葬而少发掘或不发掘村落遗址的片面现象，可惜的是这个工作刚刚开了个头，我就被迫离开了新疆队，半途而废。二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从第一篇论文《略论新疆的彩陶》开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概念和意见，它们主要是：

(1) 新疆地区的彩陶既与石器共存，也与铜器共存，还与铁器共存，它们既属于新石器时代，也属于铜器时代，还属于铁器时代。

(2) 过去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是属于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真正准确像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尚未发现。

(3) 提出了新疆青铜时代的概念，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左右。

(4) 提出了新疆早期铁器时代的概念，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1000 年至公元前后。

(5) 新疆地区铁器出现的年代较早，大约早于我国中原地区约 300 多年。

(6) 提出了新疆史前时期或史前文化的概念，具体内涵包括汉代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7) 发现、确认并提出和命名了新疆地区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同时对其进行了文化类型的划分研究。

(8) 确认并提出和命名了焉不拉克文化。

(9) 确认并提出和命名了苏贝希文化。

(10) 确认并提出和命名了伊犁河流域文化。

(11) 反对将新疆地区的考古遗存轻易地、无大把握地与古族名或古国名相套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12) 新疆地区的考古文化既与周边地区有密切的联系，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在注意某些因素的外来起源时，更要考虑当地的土著渊源性。

这些认识虽然在开始时有的还不免模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料的增加丰富，都是处在不断的充实、完善和提高中。例如在我最初的文章中，曾经使用的字眼是不太明晰的“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远古文化”，后来则统一为明确的“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和“史前文化”或“史前时期”；开始时对文化类型的划分是较多而散碎，后来则将许多类型统一为同一种考古学文化。这既反映了新疆史前时期学术研究的变化历程和不断提高进步，也说明这些理念始终贯穿于我的学术思维中，这也就是说，我的学术研究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既未掠人之美，也不朝秦暮楚，平稳而已。

我的感觉是，这些新的观点、概念和意见极大地改变了新疆史前时期的研究状况，使其步入了新的阶段。试想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新疆史前时期的认识有多少呢？除了几乎到处都是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其绝对年代基本上均为春秋战国时期之外，其他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现在，不但有了比较明确的史前时期概念，而且内容也丰富了很多，研究深度已远远超过了以往。正因为如此，目前正在进行编撰的重大科研项目“新疆通史”就专门列出了独立的一卷为“史前卷”，可见其已举足轻重了。当然，我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和概念也会遇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学术研究中很正常的现象，而且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论，才能取得共识，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不过，我也感觉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资料的不断涌现，我的这些观点和概念似乎还是经受住了考验，有很多基本上已被学术界所接受。我还较有信心地预料，在今后一定长度的时间内，它们还会发挥相当的影响和作用。想当初，我刚刚提出这些观点和概念的时候，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唯恐捅出什么大娄子，因为这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啊！现在则要放心多了，且有欣慰之感。

这本论文集得以出版，完全依赖余太山先生的热心和推荐。我与余先生以文相识，时有书信往来，是他建议我将过去发表的论文选编成册，再由他联系出版社予以出版。由于他的努力，终于将此书的出版工作委托给了商务印书馆。在此，我要向余太山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戈

2011年4月4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目 录

第一部分 综述

- 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 3
- 新疆考古述论 58
- 新疆古代文化遗存概说 96

第二部分 史前时期

- 略论新疆的彩陶 105
- 关于新疆远古文化的几个问题 139
- 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 158
- 新疆出土的早期铁器——兼谈我国开始使用铁器的时间问题 173
- 吐鲁番地区的史前文化 183
- 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 198
- 齐家文化应属青铜时代——兼谈我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 211
- 新疆发现的石刀、石镰和铜镰 225
- 新疆史前文化研究评述 237
- 新疆远古文化初论 245
- 新疆史前文化 338
- 史前时期的西域 366
- 为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一书所作之序 429
- 略论焉不拉克文化 437
- 新疆察吾乎沟口文化略论 459

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 473

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 513

察吾乎沟口文化的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 549

关于焉不拉克墓葬的讨论 567

关于如何认识和界定新疆青铜时代文化的讨论 571

关于如何认识和界定新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讨论 576

关于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再讨论 581

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讨论 585

焉不拉克文化补说 589

再论察吾乎沟口文化 597

第三部分 历史时期

唐轮台在哪里 613

新疆米兰古灌溉渠道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 622

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 644

铁门关、铁关谷和遮留谷 658

别失八里（五城）名义考实 663

明陈诚使西域经行新疆路线略疏 677

新疆古代城址的考古学研究刍议 691

昌吉古城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研究 696

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述略 726

新疆发现的竖穴洞室墓 741

参考论著 760

索引 797

第一部分 综述

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

新疆位于亚洲腹地，是中西交通的陆路必经之地。这种地理位置，使其交通路线具有重大的意义。大凡研究西域史的中外学者，无一不用或多或少的篇幅对新疆的古代交通路线给予阐述和讨论。但是，回顾往昔的研究成果，似感有几点不足：其一，各家的论述重点多是一些主要干线，而对其他许多支线却少有论及，故嫌不全；其二，对一些主要干线在新疆境内的起始和终结路线缺乏探讨，故不甚明晰；其三，论述某一时期的交通路线者多，而比较全面地阐述新疆整个古代时期的交通路线者少，故缺乏总体概念。因此，对新疆古代的交通路线做比较全面、综合、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即拟针对上述的三点不足而对新疆的古代交通路线做一比较全面但又简略的论述。限于篇幅，除对某些争论较多的线路和地点稍做必要的考证外，其他一般以直述为主。

一、主要交通干线

《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道从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魏书·西域传》：“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①；《隋书·裴矩传》：“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这是关于新疆古代有几条主要交通干线的明确记载。实际上，古代新疆境内的主要交通干线应有四条，即南道、中道、北道和大北道。兹分别述之。

^① 此处的所谓四道包括了从莎车分歧的两条路线，其实，莎车是南道上的一个终点，由它分出的两条路线是南道的终结路线，所以该四道之谓实际上仍是二道。

(一) 南道

这条干线位于新疆南部，处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与昆仑山北麓山前地带之间。其名称自古以来少有变化，除唐道宣所撰《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中称作“中道”外，其他史书均称为“南道”。关于这条干线，见于正史的确切记载如下：

《汉书·西域传》：“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

《后汉书·西域传》：“自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

《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南道西行，且志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扞弥国、渠勒国、皮山国皆并属于阩”。

《魏书·西域传》：“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此虽为三道，实际上都是指南道而言。《北史·西域传》所记与之相同。

《隋书·裴矩传》：“其南道从鄯善、于阩、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又西二百里至新城……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又西经悉利支井、沃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阩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阩”，“于阩西五十里有苇关，又西经勃野，西北渡系馆河，六百二十里至鄯支满城……又西北经苦井、黄渠，三百二十里至双渠……又西北经半城，百六十里至演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镇”。

这些记载，虽详略不同，但其具体路线与今天仍然通行的若羌、且末、民丰、于阩、策勒、和阩、皮山、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这一交通大道基本一致。

南道是否从汉代才开始通行？否。在先秦文献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庄子》等书中都有关于“昆仑山”、“昆仑之丘”、“群玉之山”、“钟山”、“春山”等记载，昆仑即今昆仑山，钟山、春山即葱岭，今称帕米尔，这都是南道上的地理特征。昆仑山产玉，“昆山之玉”在战国时已被中原各国视为宝物。^①实际上，早在殷代，和阗所产之玉石就已传到了内地，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许多玉器经鉴定多系和阗玉就是证明。^②这些情况说明，南道之通行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自汉代开始，南道大为繁荣，历数代而不衰，许多著名的使者、僧人、商旅等均经行此道东来西往。张骞出使大月氏返回时，“并南山，欲从羌中归”^③，南山即昆仑山脉，羌中即新疆南部和青海一带。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去时，“分为数军，从南北道”^④，归时，“还过扞弥”^⑤，扞弥即今于田县。东汉班超初入西域，先到鄯善，再到于阗，又复往疏勒^⑥，鄯善即今若羌，于阗即今和阗，疏勒即今喀什。三国时，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家僧人朱士行为求梵书正本，“西渡流沙，既至于阗”^⑦。北魏时，宋云、惠生赴印度，“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从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从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戛城……从捍戛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阗国……入朱驹波国”^⑧，左末城即今且末，末城即今尼雅，捍戛城即今于阗，朱驹波即今叶城。南齐时，益州刺史刘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道经鄯善、于阗”^⑨。唐时，名僧玄奘从印度返国，途经佉沙国、斫句迦国、瞿萨旦那国、媲摩城、尼壤城、折摩驮那故国、纳缚波故国等^⑩，佉沙即今喀什，斫句迦即今莎车，瞿萨旦那即今和阗，媲摩城即今于阗，尼壤城即今尼雅，折摩驮那即今且末，纳缚波即今若羌和米兰一带。五代时，张匡邺、高居诲使于阗，

① 《史记·李斯传》载李斯上书中言“昆山之玉”是数宝之一；同书《赵世家》记苏厉书信中称“昆山之玉”是三宝之一。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③ 《史记·大宛列传》。

④ 《史记·大宛列传》。

⑤ 《汉书·西域传》“渠犁国”条。

⑥ 《后汉书·班超传》。

⑦ 慧皎：《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

⑧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

⑨ 《南齐书·芮芮虏传》。

⑩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至大屯城……又西，渡陷河……又西，至绀州……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阆”^①，大屯城即今米兰，绀州即今且末。宋时，拂林国使团贡方物，“东至西大石及于阆王所居新福州，次至旧于阆，次至约昌城”^②，约昌城即今若羌。当时，“自瓜、沙抵于阆，道路清谧，行旅如流”^③。元时，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中国，道经可失合尔、鸭尔看州、忽炭州、培因州、车尔成州、罗不城等^④，可失合尔即今喀什，鸭尔看即今莎车，忽炭即今和阆，培因即今于阆，车尔成即今且末，罗不即今若羌。当时，元朝在这条路线上还“立于阆、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⑤，“立罗不、怯台、闾鄯、斡端等驿”^⑥，怯台殆即《新唐书·地理志》中的七屯城，怯、七和台、屯均一声之转，地当今之米兰，闾鄯即车尔成，斡端即忽炭，均同名异译。明代，波斯国王沙哈鲁派遣使团来中国，返回时，经由和阆和喀什噶尔^⑦；仁宗敕都指挥李英讨伐安定和曲先，“逾昆仑山西行数百里，抵雅令阔之地”^⑧，雅令阔即鸭尔看。清时，该道的东段部分沙侵严重，往和阆、喀什者多由中道绕行而至，但原来的路线仍然可以通行，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五对此线记载甚详：“密远西行一百里卡克里克，一百里甜水泉，一百里凹石峡，五十里茄绊卡的，六十里布古里克，渡卡墙河，沿河西南行八十里抵敏托海，七十里英苏，八十里塔得朗，六十里卡墙……四百一十里安多罗，又西戈壁，四站三百四十里尼雅，又西三站二百六十里克里雅庄，今于阆县，又西五驿四百五十里和阆直隶州城”，密远即今米兰，卡克里克即今若羌，卡墙即今且末。上述情况表明，南道自古以来始终通行不断。丁谦认为这条大道在元魏以后即已荒废，直到清代乾隆时复又开通^⑨，明显与史实不合。

关于南道的起始路线，有关史籍多只言从敦煌或玉门、阳关至鄯善，但具体路线并不清楚。细考之，在鄯善以东的起始路线应有四条。

①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于阆”条。

②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四“拂林国”条。

③ 《宋史·外国传》六“于阆”条。

④ 《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五十、五十二、五十六章，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⑤ 《元史·本纪》八。

⑥ 《元史·本纪》十四。

⑦ 〔波斯〕火者·盖耶速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7页。

⑧ 《明史·西域传》二“安定卫”条。

⑨ 丁谦：《汉时西域南道久塞复通考》，载《浙江图书馆丛书》初集。

第一条是从玉门关向西至楼兰，然后再从楼兰向西南至鄯善。汉玉门关一般认为在敦煌西北约七十多公里的小方盘城，但据近年的考古新资料，关址似应在小方盘城之西约十一公里的马圈湾西侧^①，楼兰即今罗布淖尔西北的楼兰古城。从玉门关至楼兰的一段路线实际上也是中道的起始路线，我们将留在下文谈及；从楼兰至鄯善的一段大约是沿罗布淖尔西岸经海头、阿不旦而至今若羌。海头即斯坦因曾经调查的LK遗址，位于楼兰古城西南约五十公里处^②，阿不旦在今米兰北约二十五公里。这条路线在楼兰繁荣之时，亦即汉晋时期，是去南道的一条主要路线，大凡这个时期史书中所言从玉门关至鄯善者多指这条路线。《汉书·西域传》传首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一般人们都认为出玉门即走北道，出阳关即走南道，其实，出玉门关除了走北道外，还可走南道。试观同书同传“乌弋山离国”条“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即可表明走南道既可从玉门关出，亦可从阳关出，而从玉门关出者即是走这条路线。《后汉书·西域传》“出玉门，经鄯善”和《魏略·西戎传》“自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即是明指这条路线。当时楼兰城是玉门关外唯一的一座沙漠绿洲城镇，来往行旅在踏入罗布泊地区的艰辛路途之后，中途取道此城进行休整，并补充旅途食用物品，以便继续前进，这是意中之事。王国维曾根据玉门关附近出土的一枚记曰“出粟一斗二升以食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八月癸卯”的汉简指出，从玉门关至楼兰，再“自楼兰故城始，自此以南，则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亦行至莎车”，其说甚是。但他同时又认为“南北二道分歧不在玉门、阳关”，“二道皆出玉门，若阳关道路止于婼羌，往鄯善者绝不取此”，“楼兰之东实未分南北二道”^③，将玉门关至楼兰的这段路线当作去南道和北道的唯一一条起始路线，未免有些失之片面。玉门关是因运输玉石过此而得名，而玉石的著名产地于阗和莎车均位于南道，此可证这条路线的开通相当久远。但其通行时代却不

①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0期，第1—8页；吴祜骧：《玉门关与玉门关侯》，《文物》1981年第10期，第9—13页。

② 王国维曾经根据有名的“李柏文书”的出土而将海头遗址定为LA亦即楼兰古城（见《流沙坠简序》，载《观堂集林》卷第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9—834页），但后经日本学者的研究，“李柏文书”的出土地是在LK遗址，因此，海头应即LK遗址（参见〔日〕长泽和俊：《楼兰王国》，日本角川书店1963年日文版，第35—38页）。

③ 王国维：《敦煌汉简跋十四》，载《观堂集林》卷第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2—863页。